

宣傳參考資料第四輯

「五四運動」資料特輯



只供參考
不准售賣

時代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宣 傳 資 料 第 四 輯

五 四 運 動 第 二 輯

五 四 運 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128B

時 代 出 版 社 印 行

~~1606624~~

例言

一、宣傳參考資料每月一輯，供各級參考。

二、資料內容，可引用轉載或翻印，但不必註明根據本刊。

三、此項資料特輯，須妥慎保存參考，不准公開發售或餽贈。

四、如有疑問或批評建議，可逕函南京八〇八號信箱。

宣傳參考資料業已出版各輯內容：

第一輯：美國、蘇聯與中國

第二輯：「青年節」資料特輯

第三輯：中共問題資料特輯(一)

第四輯：「五四運動」資料特輯

宣傳參考資料第四輯

「五四運動」資料特輯

目次

例言

史料

「五四運動」的經過

特載

告革命青年

「五四運動」資料特輯 目次



資料室

陳誠

文 選

- 一、總理鑑臨下的「五四運動」
- 二、「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影響
- 三、「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現階段的思想
- 四、「五四運動」的意義與教訓
- 五、比「五四」更偉大的時代
- 六、論「新五四運動」
- 七、學生與政治
- 八、「五四」二十五年
- 九、「五四運動」與東方文藝復興

編後記

葉楚傖

朱光潛

賀麟

簡貫三

胡公冕

應雲衛

梁實秋

傅孟真

馮大麟

史料

「五四運動」的經過

資料室

民國六年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向德絕交。同年八月十四日段政府正式對德奧宣戰。其主要的企圖則是在藉參戰而增加實力與威權，摧殘反對黨人，所謂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祇藉此擴大其私人武裝而已。

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與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歐戰結束，戰勝的英，法，日，美爲了處置戰敗國，於翌年正月召開所謂「巴黎和會」(十一月)事前日本鼓動對中國參戰不力提出警告性的覺書，并有人主張中國在和會中不應有發言之地位。大會進行至正月二十七日(民國八年)中國代表王正廷、顧維鈞與日本代表牧野(Baron Wakai)松井(Matsui)二氏在「十人會」中因山東問題發生爭執，二月十五日中國代表向大會提出一關於山東問題之論帖，此後復提出廢除民四廿一條件之論帖，及關於外人在中國特殊利益之論帖，指明這是世界真正和平的保障與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所繫

，其結果竟遭大會否決：「不能認爲在和平會議權限以內」，這一問題直擱置至四月中旬始再度討論，英國代表魯易喬治（Lloyd George）且提議以山東交國聯以委任統治的方式管理，中國代表團多方指明，以歷史、人口、經濟、形勢國際關係，山東應爲歸還中國，經過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十人會」會議後，列強遂不顧中國的地位，決議允諾將戰前德國在膠州及山東所有各項權利讓與日本，並於和約中作下列規定：

「德國允將西歷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德條約所規定膠澳租借地暨鐵路礦山及水底電線等項，與其他中德迭次所訂關於山東之各案前後所規定德國享受之種種權利及所有權或特權完全讓與日本」（參看對德和約一百五十六條，一百五十七條，一百五十八條）

巴黎會議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就掀動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五四運動」如火山的爆發般的開始了。五月三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召集京市各校代表并全校同學舉行大會，決議於四日舉行集體示威遊行，警告賣國政府，四日晨并由推定的京市八校代表商量具體的計劃，據東方雜誌記載：

「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學生，因巴黎和會議定，將青島讓與日本，非常激憤，於本日聚集數千人，排隊出行，爲一種示威運動，并四處分送傳單，手執白布旗，書力爭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先至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遞意見書，途經曹汝霖住宅，羣擁入質問，適回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衆攔阻，受傷甚重，尋曹宅火發，學生救隊散去，警察及步兵游擊隊捕去學生數十人」（東方雜誌八年五

月號中國大事記。

四日午後一時遊行的學生羣聚於天安門集合，向東交民巷出發，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大隊行至東交民巷西口，爲巡捕攔阻，因舉數位代表，分赴各使館接洽，羣衆如潮水般的仍繼續經過東長安街，東單牌樓前進，沿途人民均藉以熱烈歡呼，大家所喊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取消二十一條件」，「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當時的宣言，是由羅家倫起草的，其全文是：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被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一運動發生後，震盪了全國的青年學生與廣大的人民。北京的學生界，一方面從事營救被捕的三十二位同學，一方面進行鞏固與擴大這一愛國運動，經各校代表的決議，在被捕同學釋放前，全體罷課，五月六日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通電巴黎專使及全國各界，這時全國教育會與輿論界亦作熱烈的聲援，京市十三院校長亦同時開會，聲明這次運動是全體學生的共同行動，不能使少數人負責，後來由汪大燮、王寵惠、林畏民等担保，遂於七日上午釋放被捕學生，八日各校遂一

律復課。然而愛國運動却繼續積極的展開，組織演講團到各地演講，喚醒民衆，支持外交，抵制日貨，一方面組織十人團，維持內部的秩序，當時的計劃和行動，是異常的周密。

天津方面以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爲中心，聯合各校於十四日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上海方面，於六日接到消息後，邵力子先生首先在復旦大學報告經過，即於八日聯合滬市各校會商響應，井作成意見電巴黎專使拒絕簽字，十一日正式成立上海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推定程天放爲執行部主席，何葆仁氏爲評議部主席，章益氏爲副主席，總務部長爲李鼎年。開始聯合商界工界作廣大的號召，接着南京，武漢，杭州，濟南，陝西，山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安徽！各省學生都潮水一般的響應起來。

歐美留學生亦聯合推舉代表，分向各國陳述我國對山東問題的決心，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工會，亦紛紛組織國民自決會，抵制仇貨，及組織各界聯合會，一致向北京政府警告，非至撤回山東，決不中止，民氣的高揚，史無前例。

北京政府對澎湃的學運高潮逐漸的採用高壓政策，於是五月九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辭職出京啓事，文曰「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北京學生於五月十九日再度宣佈罷課，井決定六項條款，要求北方政府答覆：（一）對巴黎和會拒絕簽字（二）嚴辦賣國賊，（三）挽留教育部長溥增湘和北大蔡校長，（四）撤消對學生會的警備，（五）向日本政府抗議五七國恥日逮捕留學生，（六）恢復南北和議，結束國內戰爭

，實行團結禦侮。第二天起學聯會動員全體學生出發演講。

此後，北京政府完全依照日本人的指示，下令拘捕學生，慰留辭職曹陸章，全國輿論沸騰；天津的學聯會於五月二十三日起宣佈罷課，濟南的學聯會於二十四日宣佈罷課，上海的學聯會於二十六日宣佈罷課，南京學聯會於二十七日宣佈罷課，保定學生界亦於二十八日罷課響應，在北京政府直接統制下的演講學生，則橫遭拘捕，六月一日下令武裝查禁學生聯合會，二日三日捕去學生近二百餘，以北大第三院爲臨時拘留所，據北京學聯會二日通電報告：

「……學生遊行講演，各學校之出發者九百餘人，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北京大學法科已被軍警佔據，作爲臨時拘留所，拘留學生於內，校外駐紮兵棚二十，斷絕交通，軍警長官對學生任意侮辱。……重傷者二人，旋被送入步軍統領衙門，擄掠備至，尙不知能否生還……一日不死，此志勿奪，殺賊殺敵，願與諸君勉之。」

四日北京政府繼續大批拘捕學生一千五百餘人，第二日出動演講人數達五千餘人，北大第三院拘留人數已滿，乃又增加第二院爲臨時拘留所，上海學聯會知道賣國政府的執迷不悟，非聯合全國各界的力量，不能使其屈服，自三日起各處出動，到各商店工廠，挨戶宣傳，痛哭流涕的呼號吶喊，其爲工商各界的感動，相繼罷工罷市，成爲一時清瀟涵沔的力量。

在這高潮中間，全國各地學生代表集中上海，其時 國父孫中山先生適住在上海，（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每日接見各省的學生代表，據當時北平學聯代表羅家倫言：「他對參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熱烈去吸收的。在上海見北京學生代表，每次總談到三四點鐘，而且愈談愈有精

神。L（見羅著黑雲暴雨到明霞六九頁）同時有一次接見上海學聯會代表復旦大學學生程天放，曾經指示說：

「青年學生激於義憤，出來奔走呼號，挽救國家的危亡，我是很表同情的。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日本是個強國，我們是個弱國，武力打不過它。但是日本是個先天不足的工業國家，完全要靠國外的貿易才能維持國民的經濟。學生現在實行抵制日貨，是很有效的方法。不買日貨，就可以在經濟上致日本的死命，希望大家堅持到底。不要虎頭蛇尾。」（見程天放作 我初次謁見總理載三十四年五五掃蕩報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特刊之一）

這給予五四運動一個最有力的指示。各省代表經過一番鼓勵，於六月一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大會間，決議三條政治綱領：（一）政府明白宣佈不簽字於巴黎和約；（二）取消二十一條件及中日軍事協定；（三）請懲辦賣國賊以謝天下。

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各學聯代表「常常到 總理寓所去請益」（程天放）。國父會有一封信覆上海學聯代表，鼓勵澈底開始革命事業，原函會載上海學聯會日刊，又有一封信給天津學生聯合會譚伊助（北洋大學學生）「深望結合同志為最後之奮鬥，以達最後破壞之目的」。（原刊請見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紀念黨史展覽會陳列）。

當時，國父并聯合軍政府六總裁電北方政府，營救學生，原電云：

「頃聞北京學生，為山東問題，警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諸人，發生傷憤之舉，有將為竹學生，處以殛刑，并解散大學風說，不勝駭詫，青年學生，以單純愛國之誠；逞一時血氣

之勇，雖舉動略逾常軌，情有可原，且此項問題，何等關係？凡屬國民有常識者，無不奔走駭汗，呼號以求一當。義憤之餘，疑必有人表裏爲奸，則千夫所指，證以平日歷史，又安得不拚命以求公憤？其中真象若何？當局自能瞭解，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威於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作始也微，將畢也巨。此中機括，繫於一二人善自轉移，執事洞明因果，識別善惡，宜本平情之處置，庶服天下之心。敬希胸臆，願熟察焉。

普通電代表全國人民的呼聲，符合羣衆的要求，并同當時廣大羣衆的具體要求相聯系，各界乃倍增勇氣，每日致北廷電報及巴黎專使電報數千份，北京政府，不得已於六月十六日下令免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及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人的職，於是這些較著名的賣國賊跌下舞台。此後，全國的注意力乃轉向巴黎和約的簽字問題。在和約簽字的前一日，（六月二十七日）總統府出入大道的新華門前，擠滿民衆的請願代表。北京學聯會及山東協會的七團體代表，要求面見徐世昌總統，通宵達旦，一方面在巴黎的留學生與華僑亦集合包圍中國和會代表的住宅，監視其行動。直到中國代表宣佈拒絕簽字，各請願代表才散去，中國代表在宣佈拒絕簽字後，曾發表宣言云：

「……中國全權之此舉，實出於不得已，惟於聯合國團結上有所損失，殊覺遺憾，然捨此而外，實無能保持中國體面之途，故責任不在中國。而在於媾和條款之不公也。媾和會議對於解決山東問題，已不予中國以公道，中國全權願竭誠布陳，靜待世界公論之裁判」。

這樣五四運動乃得第一次以學生領導力量，戰勝了強權，如國父所說：「試觀此次學生運動，不過被激而興，竟以極短之期間，收絕倫之鉅果，可見結合者即強也」。十月十八日在滬賽球中國

「五四運動」資料特輯

學生會講：救國之急務。



特載

告革命青年

陳誠

——為民國二十九年「五四」紀念而作——

「五四」運動已屆二十一週年，回顧當時青年由救國運動促起整個社會思想與文化的革命，造成了我國近代民族自強自勵與力求解放的革命運動，這種光榮的史實，永遠鼓勵着我們青年與革命的敵人作殊死戰，為尋求整個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奮鬥。

然社會的變革與歷史的進展，使我們青年今日所處的環境與「五四」時代完全兩樣了，而今日中國青年對於革命所負的責任，也是完全不同。今日我們所處的是抗戰與建國的時代，全國青年在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進行着對日周抗戰，已經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同時革命建國的大業，也正在蓬蓬進展；因此，今日我們青年奮鬥的途徑，應與過去完全不同，而所負的責任，亦與革命之進展同時加重。今天趁這偉大的「五四」紀念日，特就當前時代的使命與革命青年的責任，闡誠

以告我親愛的青年同志們：

第一、我們認識當前時代的使命，是在求第二期國民革命的完成。爲達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青年要深刻瞭解國家之統一與民族之獨立，爲現代中國一切問題最基本的前途，唯有求得統一與獨立，才能保持中華民族五千年光榮的歷史，創造富強快樂的三民主義新中國。因此全國青年必須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絕對以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爲前途，並以古今的自覺與自信，愛我們的國家與民族，愛我們燦爛的歷史與文化，來訓練自己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第二、我們要認清現在與未來的革命責任。青年主要的革命責任，是在未來，而不是現在。因爲現在革命的責任，已經由我們的長輩和負着。國家爲青年最大的理想，是要求青年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繼續革命先烈的遺志，爲久遠而艱鉅的建國事業而努力。所以領袖訓示我們：「中國將來命運，實繫於一般青年之身。」我們更負起未來的革命責任。毋負國家與領袖的期望，只有現在埋頭準備，努力充實建國的智能，鍛鍊強壯奮鬥的體魄，並特別注意生產技術的培養與國防科學的研究，以及本國史地文化的潛修。這樣，我們青年才能成爲建國必需的人才與復興民族的骨幹。此外，我們青年尤其重要的是要砥礪忠恕愛國的精神，養成高尚純潔的人格；對於青年同志之間，必須相親相愛，如手如足，彼此甘苦共嘗，精誠團結，互助合作，具有利於愛人的精神，以造成中國青年的道德的典型。

第三、我們要正確地解除青年本身的苦悶。在思想上，只有信仰三民主義是最正確最革命的道路。我們國家在內憂外患之中，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戰勝敵人，完全依靠國民黨有偉大英明的領袖——本黨總裁，他喚起全黨同志與全國軍民起來抵禦外侮復興民族。最近三年之間，本黨同志犧牲於槍林

彈雨中者，前後已達一百數十萬人，這種無大壯烈的犧牲，是國民黨對於國家民族最大的貢獻，我青年同志只有在最進步，最能奮鬥犧牲的國民黨領導之下，才能謀國家民族的出路，從而謀大家個人的出路。其次：關於青年生活與職業的苦悶，在抗戰建國的有利條件中，一定會得到澈底的解決，因為我們過去與現在生活的困難和失業的痛苦，皆由於帝國主義日寇軍閥對我們種種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侵略，以及國內的軍閥官僚與反動份子割割破壞所造成，今後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則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因素，已根本剷除，我們青年便可以過自由快樂的幸福日子，尤其在建國的過程中，國家需要千百萬的建設人才，我們青年正可以各盡所能，貢獻國家，來負起建國幹部的責任。

第四、我們青年應當有自立自強之精神，增進本身修養的工夫，這種修養的工夫，就是要喚起青年渾身奮發，砥礪自立自強之精神，以克服惡劣的環境，清除社會的怨尤。我們知道青年對於政治的不滿與社會的煩悶，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應當求之在己，從今立志刷新政治，改革社會，因為未來的社會是我們的，那些腐敗的一份，終將為時代的輪齒所毀滅，語云：「任平死者，葬平死者，」便是這個意思。我們要緊的是振作自己，發奮圖強，將來從我們自己的手上創造一個完善的社會。如果我們不注意這點，徒怨天尤人，將來難免蹈前人的覆轍。試看「五四」時代打曹汝霖的青年，現在怎樣了呢？這是眼前的經驗與鐵證，我們必須引為鑑戒，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未來的世界，方能一代勝過一代。

最後，我們要瞭解目前青年運動的特點，是建設的，統一的，積極的，不是破壞的，消極的。過去青年運動往往只有個人的關係而無組織的領導，只見感情的衝動而不重理智的分析，因此青年「了

投機者私人的或派系鬥爭的工具，作了無謂的犧牲品，而「五四」運動之所以能貫徹持久，也正因為缺乏組織與訓練。現在自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青年運動有了顯明的目標，今後全國青年在統一的組織與訓練之下，每一個人那成了國家的青年，因此我們必須聚斂羣力，一致從事社會服務與生產建設，並埋頭充實建國的智能，以統一的，建設的，積極的青年運動，來推動社會的進化，促成革命建國的大業。

總之，我們青年今日處在抗戰建國的偉大時代中，必須認清歷史的時代的使命，與本身的革命的責任，來努力為國家民族謀出路，換言之，就是要貢獻個人的平等自由，以求取國家民族的平等自由。總理北上與黃埔同學最後告別時曾訓示我們：「大家與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只有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這段遺囑是總理對於青年革命救國的最懇切的指示，我們希望每個立志革命的青年同志，要遵照這偉大的遺教，從今便有充分的準備與堅強的組織和訓練，來替國家民族謀出路，這出路，決不是少數人的出路，而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共同一致的康莊大道——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康莊大道。青年同志們！我們是革命的先鋒隊，我們更勇敢的向着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道路齊步邁進！

(完)

文選

一、總理鑑臨下的「五四運動」

葉楚傖

民國七年五月四日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警鐘打到了上海，上海學生全體發動，全上海市充滿了打倒賣國賊的呼聲，由於學生所誠的感動，商人跟着全體罷市，在這高潮中，北平的軍閥政府見勢不可遏，祇得將曹汝霖陳宗貞章宗祥罷免了。

那時，有一段經過應該報告的，五四運動的前後，本黨總理孫先生正在上海，知道這運動充滿了青年愛國的純潔情緒而又體會到環境的複雜，怕挫折了青年情緒的萌芽，立刻召集當時在滬的幹部同志，分頭指導，盡力扶護，到曹陸章罷免消息到滬，便又立刻指示停止進行，恢復罷課罷市以前的原狀，所以五四運動的經過是齊齊整整，五四運動的結果是圓圓滿滿，青年運動的萌芽從此滋榮繁茂，而且滋榮繁茂在困難環境之中了。

我在今日特地提出上一段的報告來有三個重要的意義：（一）是在民衆運動中須有正確的指示；

(二)是在民衆運動中頗有誠的信仰與服從；(三)是在民衆運動中頗有深切的感化。

當全上海學生出動時，市正當局之下，秩序井然。警察與市井之共感，便是兩世界的警察與市井的當局也認識了這種純潔的動機，或則譏然同情，或則爲之驚愕。不特如此，連那些流氓竊盜在這時期內也戢然不動，助成了空前的秩序，例外的安甯。至於全市商家對學生勸告盡情表現了如兄若弟患難相扶的情感，尤爲平生所未見。罷市期中的莊嚴靜肅，恐怕世界也無此先例。這固然攸賴於幹部之健全，指示之正確，而學生全體純潔精神的感化，實爲歷史上的奇蹟。

凡是罷學罷市等普通的意義，是一種反抗的表示，衆志的示威，若時間過長，最易發現弱點，或因生活的關係，或因政治的立場，或因社會的背景，種種魔難，隨時可作，而在五四運動中，條件是超過於示威表示的，環境是困難於他國士的，但是能莊嚴靜肅，一德一心，相持到曹陸章罷免，這已是令人欽佩了。待曹陸章罷免消息到後，當然有人作再進一步的主張，也當然有人想起其他的作，那時本黨總理熟思深察，認爲青年萌芽已滋已榮，不宜久禁於外，凌霜犯雪，毅然作可止則止之指示，商學各界便立刻復員，這種一致貫徹的偉大精神，令人至今思之，穆然起敬。這固然攸賴於總理偉大精神之感化及正確之指示，而青年的信仰與服從，實可爲今後以至於無盡之模範。

就報告的意義而加以事實的說明略如上文，更綜合來說：(一)因青年先有了純潔的動機，然後能感化及於羣衆；(二)因青年受了總理的感化，然後能發純潔的動機；(三)因總理有了澈透的認識，然後有正確的指示；(四)因本黨主義與總理精神之感化，然後能致青年之信仰與服從；(五)

因有正確之指示，然後對於民衆之勸諭有合理之定程；（六）民衆運動有合理之勸諭，然後能滋榮繁茂，以上六點，願吾全國青年，全黨同志，於此五四紀念日，深深記取，永矢不忘。

際此抗戰建國時期，人民是國家的主力，青年是全民的動力，情緒熱烈，過於當年，勸諭如何，尤關國運，我們的最高領袖續總理遺緒，爲全國司命；對全國青年的誨誨告誡，至再至三，精神總動員綱領固爲全國人民所當共同遵守，但青年的責任尤其重大，五四運動時總理所指示我們的是甚麼？抗戰建國中領袖所期望我們的是甚麼？將過去的回憶，將來的使命，合併起來，就是這一次五四紀念的教訓，我們認識五四運動的意義，我們循着光榮的歷史前進。

二、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影響

朱光潛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開始，日本乘德國無暇東顧，派兵強佔我們租借與德國的青島和膠濟路；一九一五年五月六日日本向我國致哀的二十一日通告，強迫袁世凱所領導的政府簽訂廿一條款，其中包含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歐戰結局後，一九一九年各國在巴黎開和會，日本以拒簽和約威脅和會，要求和約明文規定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我國出席和會代表電北京政府請示，當時北京政府滿佈着日本的水牙，頓首向忍辱簽巴黎和約。如果我們簽約，就是向全世界公開地承認二十一條，斷送華北大部份，讓日本操縱我們的政治經濟以至於軍事外交。爲避免這種慘禍，當時北平各大學學生羣起反對，派代表向政府請願，列隊遊行宣傳，並且轟進了漢奸軍閥趙家樓，將親日份子陸宗輿

加以痛打。那時候政府執迷不悟，想用暴力來彈壓，請願的被拘囚，遊行的被槍擊，因此激動國民的公憤，全國學生都起來響應，工商界也起來響應，上海還罷了幾天市。政府備於擊情，於是訓令和會代表拒絕簽約，同時罷免親日份子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這部「壯劇」的頂點，轟打趙家樓一幕，發生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所以世稱為「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二十三年了，許多人已經把它當作一件歷史事實記着，它可以說是過去了。但是就影響言，它還不能說是完全過去了，目前文化界的動態多少是由它種因，這次的抗戰也與它有密切關係。它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我們不僅應紀念它，尤應對它有明瞭的認識。

五四運動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不僅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簡直是中國有史以來，唯一的瀾漫全國的民衆運動。讀書人集體作政治運動，在中國本有先例，東漢太學生的伏闕上書，明末東林復社的維持清議，戊戌政變前的公車上書，都是以書生干預朝政。不過那些運動規模很小，沒有波及到全民衆。五四運動開始是學生運動，而後來則演成民衆運動。全國學生總會「立」之後，工界和商界的總會相繼起，大家都同心協力地向着政府作外交後盾一個目標走，最後居然達到拒簽和約的目的。我們可以說，五四運動是中國民衆第一次集體地覺悟到自己內責任，第一次表現共同意志於共同行動，第一次顯出民衆的偉大力量。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種政治運動，尤其重要的，是一種文化運動。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民國，却沒有完全打破封建社會的勢力，更沒有剷除封建社會的積弊。政治還是落在一班軍閥政客的手裏，政體雖爲民主而「民」就沒有作過「主」。內政外交處處表現貪污和衰弱。五四運動喚醒民衆，使他們

覺悟到封建社會的毒，覺悟到挽救危亡，必須民衆自己努力更生，而努力更生必從思想教育做起。辛亥革命祇是政治的革命，五四運動纔是思想革命的先聲。

這種思想革命在各方面可以看出。第一是出版界。五四以前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刊物不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數種。五四運動後一年之中，新出版的刊物突然增加到四百餘種之多。這在任何文明國家裏可以算是一個奇跡。第二是白話文。五四以前祇有北京大學辦「新青年」和「新潮」的幾位教授和學生們寫白話文，五四以後白話文漸爲各大報紙所採用。全國教育會在山西開會，通過小學課本一律用國語，後來這議決案又由教育部用明令公布，寫白話文的人漸多。我們纔逐漸有白話文學作品，白話文運動是中國文化史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它雖不起於五四運動，可是如沒有五四運動，它就決不會推行得那麼快，那麼廣。第三是學生風氣。五四以前，學生只知讀講義，應付考試，混文憑，結納官僚政客，作進身之階，五四以後，大家都逐漸在課堂講義以外求學問。那時杜威羅素相繼來中國講學，到處都有杜威學說研究會羅素學說研究會的組織。大家纔逐漸感覺到我們要建設文化，非多多吸收西方思想不可。與此相關的是翻譯，五四以前的翻譯多受林琴南凌又陵的影響，用深奧古文譯些第二三流作品，五四以後翻譯的數量突然增加數十倍，質的方面也比從前有進步。總之五四以後思想界一般動態都遠比從前活躍，五四運動促成精神的解放，可以說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藝復興。

五四運動的影響斷然很廣大，但是它不能算有絕對的成功。第一，參與運動者雖然有餘而沉着不足，在引起轟動一時的騷動以後，他們沒有就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組織各方面設計一種深謀遠慮的方案

，趁着那一股勇氣，按部就班地向前推進，在狂熱之中他們過於樂觀，沒有料到舊封建的勢力之積重難返，沒有拿出一種更大的力量把它加以澈底澄清。結果他們好像在一池死水中投下一塊大石，惹起滿池浪紋以後，不久浪紋漸消，水又回復到靜止狀態。他們想以民意監督政府，而沒有能建設一個健全的民意機關；他們想從文化思想與教育建設改造的基礎，而沒有能醞釀一個健全的中心思想，沒有能培養一種有朝氣而純正的學風。五四運動頗類似德國的「狂飆突進」，但是沒有一個哥德和席勒的時代接著來，也沒有一個像德國唯心派那樣雄厚的哲學潮流去灌輸生氣，它的來勢很兇猛。但是「颶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朝」，它多少是一種流產。

其次，民衆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但是不宜輕於使用，輕於使用，有自傷的危險。五四運動的動機純正，大家都得承認，但是民國九年那一年學生爲着直接交涉的問題，常以罷課爲手段，一年之中寶貴的光陰大半被犧牲，團體組織不能算是健全，不良份子利用人或受人利用的事不能說沒有。結果社會對於學生團體不免有指摘的話，助長反動者的勢力，全國學生總會不久也就解散，而五四運動領袖後來也四分五裂，五四運動的倡導者之中不能說沒有人才但是煽動者多於組織者，他們沒有明瞭一個大規模的運動成功，消極的抵抗不如積極的組織和建設，自己的力量雄厚，被反對的力量自易推翻。要使一個運動真正成爲民衆的運動，民衆必須教育，必須訓練，必須組織。否則揭竿一呼，應者雖四起，而稍遇阻力或稍歷時間，即如鳥獸散，那是不能有所成就的。五四時代罷課遊行的作風後來成爲學生運動的範本，有人譏爲浮囂，也未見得是完全出於偏見。

這一切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五四運動的倡導者，一種運動在它的幼稚期都難免有若干幼稚性，社會

環境的困難也。能一筆抹煞。五四運動的那種熱誠是可令人起敬的，有那樣的開始，如再有再撈再厲的磨練，它的功必更可觀，有些失敗的責任不在倡導者而在承繼者。我常私下拿現在的青年和五四時代的青年比較，發生種種疑問：現在的青年是否還有五四時代的那種精神呢？他們對於學術政治教育等等是否還有那樣濃厚的興趣呢？五四時代青年處於領導社會的地位，現在的青年是否還維持住這個地位呢？現在我們國家所處的境地比五四時代危難到萬倍，現在青年們是否比五四時代努力到萬倍呢？我對於這些問題不敢作武斷的答覆，留待每一個自愛的青年加以虛心反省。

（中國青年月刊

六卷五期）

三、「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現階段的思想

賀麟

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是青年最光榮的運動，自北平學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發動這個運動，迄今已有二十五年，現在我們愈紀念「五四運動」，愈覺得其意義的重大，可分三層來講：

第一，「五四運動」是青年自覺的運動，青年醒悟轉來自覺其使命之重大，是國家的主人翁，對國家社會學術文化有重大責任。

第二，「五四運動」是青年團結的運動。這運動代表全國青年空前的大聯合，青年們有了組織，聯合一氣，可以發出共同一致的要求與行動，在政治上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

第三，「五四運動」是青年解放的運動，亦即青年爭自由，爭思想言論或行動自由的運動。精

神方面，求意志思想情感的解放，青年盡量用自己的意思以求滿足自己內心的要求，對外向帝國主義軍閥舊禮教舊家庭求解放。

田青年的自覺運動，擴大發展為整個民族的自覺運動。

由青年的團結運動，擴大發展為全體國民的團結運動。

由青年的自由解放運動，擴大發展為整個國家的自由解放運動。

由此足見「五四運動」與整個民族復興運動的關係。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青年運動，而且本質上是一新文化運動，也可以說是青年文化運動。青年的自覺團結解放。建築在新文化新思想的運動上，是有本源有基礎的。新青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在一起，互相配合，是這個運動所以成功的關鍵，亦可以說遠遠的為我們近幾年來的抗戰建國運動奠下思想文化的基礎。

但時間過去二十多年了，時代改變，思想亦有進展，「五四運動」的偏激和缺陷，也逐漸揭露，我們一方面要承襲「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一方面我們亦須補救「五四運動」的偏弊。

譬如，即以自由觀念而言，在當時，自由的觀念相當狹隘，認任性，放縱，不服務，干犯法紀，不守規律為自由，實為普遍。實則不能離開紀律訓練法紀而言自由，無紀律，無訓練，無法紀之自由非自由，只是散漫濫張，無秩序，無組織而已。即以白話詩而論，當時之白話詩，無音節韻律，而現在之提倡白話詩者，則很注重音節韻律了。

當時認為介紹新知識，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必須反對傳統，打倒孔家店，殊不知介紹新知，正所

以發揚舊風，輸入西洋文化，亦正所以喚醒吾民族固有之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說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實充滿了紛爭矛盾性。復古運動者，完全排斥新思想，全盤西化論者，視固有文化如糞土，如仇讎，謗新文學的人，宣誓不讀雜裝書，提倡科學者，反對宗教，甚或反對哲學，不惟新與舊不相容，即此派新思想家與彼派新思想家亦互相水火。當時包含優秀會員最多之中國學會，竟因其中份子一部份趨向國家主義，一部份趨向共產主義，而陷於分裂，此種文化思想上之矛盾紛爭，正象徵了當時軍閥之互爭雄長，彼此火拚。

但現在我們的時代業已超出此種矛盾紛爭的局面了。新舊中西科學哲學白話文言的對立爭執，已得到相當的調解，且認為他們不惟可以相融，而且可收相反相成，相得益彰之效了。國家主義不是舶來的狹義的侵略主義帝國主義相緣的國家主義，而吸收在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裏面去了，提倡德謨克拉西而陷於放任的個人的自由主義的趨勢，在民權主義中，亦取精華去糟粕而融會在內了，基於階級鬥爭，依賴外力的共產主義，已包容在基於全民合作，發於民族本性的民生主義中了。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儘可不相容，而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却是互相彌補的有機體。三個主義的有機結合，使得其中的任何一主義，均提高了，昇華了，而另具有新意義。

新文化運動時期還有一個錯誤的看法，就是他們認為所提倡的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政治）完全是西洋文化，根本與中國文化不相干的，因為要從西洋移植科學和民主政治，故須摧毀中國的舊文化舊思想。殊不知科學與民主，均不是生硬的可以移植的，是須在木土上生長，在木土植根的，科學乃人類公產，沒有國界的，我們可以直接承受，直接貢獻。中國古哲的科學精神，亦須承繼發

揚的。民主政治的本質，在於自立法令，自己遵守，凡我們服從自己內心理性的指導的命令，就足以表現民主精神，民主政治的表現，在於人民幸福的增進，人民意志的尊重和法律軌範的遵循，亦須就此時此地之實際需要，人民程度，相機設施，不能機械地抄襲模仿的。

青年的運動，不是一勞永逸，而是萬古長新的。現時青年之自覺團結和自由自主，不是五四運動時代的那些先輩青年可以替我們代勞的，文化學問的修養，亦是埋頭鑽研，日積月累的長期功夫。所以青年的自覺，團結和自由的運動，青年尋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努力，乃是每個青年必須不斷奮勉，自求解答的課題。（三民主義半月刊，四卷九期）

四、「五四運動」的意義與教訓

簡貫三

中國青年，是捍衛祖國的志士，是掌握歷史命運的主人。此話並非張大其辭，我們一經追念五四運動的有聲有色，便證實其真實的意義。

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起，如捲入大海，茫洋浩蕩，顛倒於洪波巨浪之中，屢次奮力掙扎，企圖到達光明的彼岸。辛亥起義，五四運動，北伐革命，以及對日抗戰，都是奮力掙扎中最雄偉的表現。五四為承前啓後的樞樞，為青年運動的始基，為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的流匯。我們在五四這個紀念日將要真臨的時候，不可不回味其意義之複雜而豐富，不可不緬懷其姿態之急促而有力，作為青年前進的歷程，作為激發青年的辭索。

五四運動究具有何種意義？因為如汗漫的江河，渾渾然不易測其底蘊，所以它的意義，是澹而不

純，雜而不純，張三說，五四爲青年羣衆的愛國衝動；李四說，五四爲小布爾喬亞的逢場作戲。丁五，趙六的見解，又不同了，丁五以爲是中國式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具有「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之意義。趙六則以爲全盤是西化的呼聲浪潮，遠遠然追慕西洋的現代文明，唯恐不及，其實呢，這都是一偏之見，若細加推敲，便知五四運動一方面爲豐富的，他方面却爲複雜的。基於這個觀點，則其含義，至少有下列三樣。

青年羣衆參與救國運動的起步，鴉片戰爭之後，青年痛感國事的岌岌，奮起作救國舉動者，屢有所聞，如會季的洋務運動，康梁的變法維新，中山先生的祕密革命，辛亥年的武昌起義，莫不有青年志士參與其間，但是參加的數目與血情奮張的程度，總沒有五四時代之大而且廣。所以純粹站在青年的立場上觀察五四，則五四實爲青年羣衆參加救國運動的起步。由此起步，向前開展，這時期的青年，受了國際潮流的激盪與國民黨革命主義的宣傳的影響，其憤發的力量特別大。後來的五卅，北伐，對日抗戰都與他有一體的關係。「形大而聲宏」，迄今尙覺五四的餘音縈繞我們的心頭。

戳穿封建主義的後壁，何謂封建主義？約略言之：在經濟方面保守落伍的，手工的，地方性的生產交易；在政治方面盛行殘民以逞的武人割據官僚貪污；在思想方面崇尚形式的，死沉沉的古典主義。五四時代，有人認爲布爾喬亞得了成長的機運，姑無論是否正確，但是彼時的心目中，總是鄙視舊的經濟制度，而歡迎西洋的現代經濟制度。當時的軍伐炙手可熱，氣燄薰天，官僚逢迎阿諛，助桀爲虐，遂演出賣國害民的勾當。所以五四時代打倒賣國賊子與廢督改制之聲勢，甚爲喧騰。至於思想上，更爲澎湃，提倡白話，崇尚科學，宣揚婚姻自由，估量古學價值，真如江河泛濫，有一瀉千里之

的反封建主義。數千年來學術上，觀念上的根深蒂固之籠罩一旦受其急激的衝蕩，自然起了洗刷作用，這一洗刷，青年頭腦爲之清新謙虛；再仰首國外，始領會於中國學術之外，尚有琳瑯滿目的西洋學術，堪爲自強圖存的啓示。後來這條泛濫似的巨流，氣勢愈演愈猛，遂至鄙棄中國的一切一切，這是五四的特色，亦是五四的流弊。誠以，凡百潮流，其來也驟，其進也猛，自然急不暇擇，弄的玉石俱毀。五四，既是一個沛然的潮流，焉能獨自例外？

經濟政治思想三個反封建陣線，互相唱和的結果，中國社會一時確有蓬勃活躍的氣象，只因來勢過猛，求功過速，遂致花葉滿樹，未結豐碩的實果。

追求西洋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文明，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質，言人人殊。而五四時代的人士，多以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與賽因斯(Science)代表其特質。德莫克拉西(即民主主義)爲西洋的社會改造政治革命之理想，賽因斯(即科學)爲西洋的物質文明學術之根源，一經一緯造成十八世紀以來的歐風美雨。歐洲的風采，美洲的春光，頗具有勾引人之魔力，凡頭腦稍新者，無不表示欣賞追求。近代中國以老大的身軀，屢受海外欺凌，所以有志之士，特別五四時代的先覺人物，無不認定，非以德先生，賽先生之大力，難期引導中國躋於現代之林。這種熱騰騰的希望，固然盛極一時，可是僅只有情緒上的熱望，而沒有實際的行動，結果呢，等於望梅止渴，聊作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五四的含義，既略述如上，那末，我們就要追問它給我們的教訓是甚麼？五四好比春雷的響雷，春雷一鳴，萬物滋生，而蔓草隨之茁茁。所以它能有較好的面貌，亦有糟粕的委質，略指數點，以資殷鑒。

無革命組織不能有持久的革命行動，民國八年五四的掀起，既以打倒軍閥，剷除賣國官僚，收復祖國失地爲目標，其性質頗富有革命的意味。徒以偶然衝動，一時結合，（臨時集合譚顛學生三千人，）事前既無組織，事後亦無安排，所以趙家樓（譚顛學生在此處突燒門口張角曹汝霖的住宅）的一把野火熄滅以後，於是革命的火炬，並未繼續光大，繼而滄滄由東山西河南江蘇湖北雖有譚顛團的組織，響應北平，但是組織紛歧，如何能收統一之效表現堅韌持久的行動。有始無終曇花一現，及今思之，一方面抱無限的惋惜，他方面却獲得珍貴的教訓。

無中心思想不能顯現宏烈的革命力量，前面說過，五四的情態是極其複雜的。其思想方面何嘗不然？因爲三民主義的力量還沒有深大的發揚，於是凡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民主主義，基爾特主義，馬克斯主義，安那其主義，無不大出風頭，矛盾抵觸的刺激青年的心情。按優點說，思想或有自由發展的機會；按壞處說，中心思想未樹立起來，必是人言籍籍，目眩五色，一思想爲力量的源泉，青年爲力量的新生，一以如此思想，如此青年，無怪乎五四的形式，望之昂然，而其內容，竟缺少強韌的飽滿的革命力量。

組織統一革命的構體，中心思想是革命的神髓，五四運動剛過了二年，就現出衰歇的樣子，且很少結實的成績，似不能不歸咎於這兩點的缺乏。

仰願現在的青年，深切的體會這兩點教訓，

空空的崇尚科學而不作實際的鑽研科學，科學幾成爲五四時代的安琪兒，學者股股景仰，如大旱之望雲霓，當時，什麼科學救國，科學教育，科學文明；……這些好聽的名詞，嘗嘗說在口中，寫在紙

上，好像中國的科學氣氛，磅礴於大地之上。其實，也就是說在口中，寫在紙上而已，究竟那有好多入真如西洋的科學家，埋頭鑽研科學呢？就令有幾個青年追隨胡適之後，幹幾套「拿證據來」（胡氏謂科學的精神爲拿證據來）的把戲，亦不過是考證古書上的不大不小的問題而已。並不是說科學方法不該研究古書，乃是說如此寶貴的方法若專用在古字紙箋中，未免本末倒置。我們中國最缺乏最需者，是自然科學，先集中精力鑽研自然科學。然後行有餘力，以科學方法整理古代學術，方合緩急輕重的原則。

呼喊反日救國但奮發圖強的精神並不旺盛，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是中國反日的空進期，民國八年日本企圖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是中國反日的成熟期。這兩大刺激，動了愛國青年的真情，於是五四運動，勃然興起，五四那一天，青年們的氣憤如烈火，吶喊的口號，有：「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條」，「打倒親日份子」……反日之聲，響徹雲霄，誠有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可惜這個氣勢，發於情感的哀鳴，終於情感衰歇，始終未作實際的勢力。老年人維持現狀，中年人鋒芒稍差，青年人既背打破現狀，而又血氣方剛，可該奮發圖強了吧。但是仔細考察，青年人的真正努力，仍未達到預期的效果。自民國八年的五月四日至今年的五月四日，整整的二十年了！不但沒有肅清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反一天凶惡一天；不但沒有救出祖國，而祖國反一步危急一步，說到這裏，真是令人慄慄無地！我們想想二十年的光陰，並不算短，然而，竟讓它蹉跎的過去，我們的罪過多麼重大！舊仇未報，新仇又來，現在該當如何奮發，以贖前愆於萬一。

民國八年的五四紀念，雖過去二十年，但其意義，教訓，却很新鮮如在目前。今年的五四快要來

到，我們青年人面對着今年的五四，一定是萬感交集——興奮，感哀，歡騰，愧悔，酸辛，憤怒，一湧上心頭。青年們僅有情感，無濟於事，眼淚要向肚子裏流，鐵拳趕快拿出來，以拳對拳，以力對力，從今年五四日起，幹的更要起勁！

四月二十日於壁山

五、比「五四」更偉大的時代

潘公展

二十年前的「五四」，是中國青年集體怒吼的一天，也是中國青年用民衆運動的方式發揮革命精神的一天。然而中國青年要認清：目前的時代是比五四更偉大，今日青年的使命亦比五四時代更偉大。中國青年致力於民族獨立的偉大運動原不始於五四，而斷頭流血犧牲生命於國民革命的艱鉅過程中者更不始於五四，但是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五四所以能寫成光榮的一頁者，必有其不可磨滅的時代性在，大要言之，姑舉兩點。

五四運動，能於軍閥政府壓力之下，號召青年，赤手空拳，以與賣國官僚作集體的奮鬥。這種轟轟烈烈的精神，實在是當時全國青年受了總理革命救國百折不同的精神所感應，所以能夠繼續着先烈赴湯蹈火的氣概，誓爲國家民族生存獨立起而作肅清賣國賊的運動，故在政治史上，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參加政治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充分表現着革命青年與賣國政府的對立。這是五四精神的時代性之一。

其次，五四運動大家認爲新文化運動產兒，同時新文化運動也因五四的呼號而更推進更擴大，於

是在這個潮流裏面，因青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相互推演，收到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效果，賽因斯和德謨克拉西成爲這個運動裏面的兩大主流，兩個臺柱。當時的論壇，比之於歐州的文藝復興，以爲中國青年循此途徑邁進，當可使中國走上近代國家之大道，故在文化史上，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致力於新文化建設的一個猛烈的衝鋒，這是五四精神時代性之二。

五四時代的青年，既然實際上參加了政治革命，而影響所及又推進了文化革命，則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自有其地位，亦自有其價值，五四也就成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然亦惟其五四運動有牠的時代性，故時代一經轉變，青年運動斷不能泥守成規，時代既已演進，青年運動尤須追上時代，庶幾不致落伍或竟與時代背道而馳。

紀念五四，我們應該發揮青年爲國家民族而犧牲奮鬥的精神，但今日如何運用此種寶貴精神方能有益於當前的國家民族，則決無因襲二十年前陳法之必要。在往日，當權的是賣國官僚，自然應奮不顧身，直接起來打倒他們，而在今日，則舉國一致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抗戰建國，青年們除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真切信仰三民主義，絕對服從國民政府，與敵人漢奸作殊死戰以外，試問更有何途可走？

紀念五四，我們固然應該繼續爲尋求科學真理與建立民治制度而努力，但除了吸收西洋文化的優點以外，對於吾民族固有之道德，固有之文化，不但應當保存，抑且必須力求其發揚光大，然後民族的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力，方可於此次民族國家生存獨立所繫的神聖戰爭中充分發揮出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充實的我們民族精神，完成我們這一輩繼往開來千載一時的使命。如果我們還像五四時

代的青年一般，祇認識我國固有的東西一切都不好，而不知道數千年來我國家的光榮歷史和我民族的偉大成就；則試問國家尙何可愛，民族尙何可親；縱然激於外侮而亦知國之當救，族之當保，但如果只知道思想解放而不知解意志集中和信仰唯一的必要，也決沒有發揮偉大力量的可能。惟其我們要認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所以這一個時代的青年，應該深切覺悟，不當再走個人自由主義的道路；或好高騖遠，在此時此地來高唱國際主義。大家平實實，確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救國的道路，惟有不漠視這些民族固有的道德，一致身體力行，然後可以人人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為痛苦同胞盡仁愛，對一切的人和事重信義，還要盡一切的奮鬥力量，在這個紛擾黯淡的世界中求取真實永久的和平。

青年同志們，我們紀念五四，大家要盡力發揚五四青年精神，同時大家要使一切思想言論和行動，都適合於當前比五四更偉大千萬倍的時代！切莫辜負各位寶貴的青春；尤其切莫奢忽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偉大時代！

六、論新五四運動

鄭學稼

——為「五四」第二十七週年紀念而作

一九一八年，「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決定的勝利。翌年，召開「巴黎和會」。這個強盜分贓式會議，忘却中國參戰之功，英法等列強袒護日本。日本帝國主義便利利用和英法所訂的密

約，拒絕中國代表團的要求，宣稱有權駐兵山東，佔據膠州灣。受日本帝國主義控制的北京政府，背反民族的利益，訓令代表簽訂順從日本意志的條約。這一事實首先引起留法學生的抗議，接着在國內掀起巨大的浪濤，在北大校等領導下的五千餘學生於當年五月四日舉行示威遊行，呼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約」，「誓死爭回青島」，並焚賣國賊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痛毆駐日公使章宗祥。以後各省學生陸續響應。因為這次行動發展為偉大的歷史運動，歷史家稱之為「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始于一九一九年，終止的時期則難確定。我們如由歷史目的而言，可以說並未達到。因為當日所提出的問題：「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實現民主政治」，「發展科學」，至今都未解決。

但是五四運動却收穫了若干的效果：第一、贊助廣東的國民政府北伐，推翻軍閥的統治；第二、民族主義的發揮，在這次抗戰中，促進我民族第一號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第三、新文化的創始，使國民的文化水平提高。

「五四運動」，經過二十年的時間，還不能達到牠所提出之歷史的目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華民族的統一運動比別的民族國家遲到廿世紀二十年代才開始（英國在十六世紀，美法在十八世紀，德意日在十九世紀。）複雜的國際環境，已使她難于應付，更使她在爭取歷史要求中受嚴重打擊的，是「十月革命」給牠的影響，這一革命，使中華民族於早熟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忘却民族的歷史任務，結果形成國共兩黨的對立和戰爭。

我們不難想像：如果沒有一九二七年的內爭，中華民族的統一運動，早已完成，也就是說五四運動的歷史任務已經實現，雖然對日的抗戰也許要提早數年，但由於內部的統一，在「抗戰」中却可「建國」決不會留下今日難于克服的災難。

除非中華民族的命運，註定要陷於滅亡的境地，那總會使她復活五四運動的精神，果然客觀的條件，使本民族紀念他，那就是「二、三二運動」。

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取得決定勝利的聯合國，突然掀露對中國問題之可恥歷史一頁的祕密協定，即損害中國主權之雅爾達會議中的一部份決議。抗戰十年，有功於聯合國的中國，又受一次的欺騙。這欺騙比巴黎和會更加厲害，因為在巨大犧牲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她，不僅承認外蒙古分離，還讓三忍沙俄在東北特權的復活。不能忍受那欺騙的中國人民，為抗議東北救兵的延期，於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以陪都各大學學生為首，開始偉大的示威遊行，這一浪湧，迅速地波及全國，牠將以「二、三二運動」的名稱，在中華民族統一運動史中寫下光榮的記錄，這個運動，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補充，又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再生，筆者因此稱之為「新五四運動」。

新五四運動將和五四運動一樣，在迂迴發展中收穫牠的歷史成果。牠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值得論述：

第一、「五四運動」的具體歷史任務，是建立「民族國家」。為着這一要求，對內以廣東國民政府為中心，掃除北洋軍閥，對外解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新五四運動，必然地完成那一工作。對內澈底消滅割據的軍閥，對外解除我民族第二號敵人的壓迫與陰謀。

第二、五四運動的諸口號之一，是「德先生」。牠現在已成爲大眾週知的救民族良醫。新五四運動是，必然地尊崇他，使他以完整的姿態出現，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實現普遍的民主制，掃除貪污，鞏固統一的民主的中央政府。

第三、「五四運動」在思想方面，是「啓蒙運動」與「文藝復興」的統一。但所有的工作，不過動整理國故和介紹宋元明清各時代的平民文學，新五四運動，當然要進一步吸收各國大思想家的思想精華，配合自己的固有文化，創造新的更高度文化。也爲着這一點，我們不再呼號打倒舊禮教，而是實現男女的平等，我們不再修談文學革命，而是排除浪漫主義的文學，創造寫實文學。

第四、「五四運動」有兩個容額，一方面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發揮牠的意識，另一方面，却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追求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結果這兩條直綫平行地發展，而難相交於一點，新五四運動則由具體的歷史演訓中，認識十月革命精神已經死亡的演變，發揚民族主義，並在勞資合作，發展民族工業前途下，改善工人的生活 and 扶助民族企業。

「五四運動」由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五年所得的結果，只是具有統一雛形而無民主的國家。新五四運動的要求，何時完全實現，大半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小半則視國際局勢的演變。是否還要經過另一次世界大戰，那難於預言，因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不是我們，而我們反須體受其最大的損害。

在「五四運動」第二十七週年紀念中，我們要爲新五四運動而努力。新五四運動萬歲！

（民主與統一，創刊號）

七、學生與政治

梁實秋

「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是北京的一個中學學生，當時的學生運動，我也跟着比我年長的同學們而積極的參加了，例如遊行示威，宣傳講演，製旗幟，貼標語，散傳單，喊口號，發快郵代電，草宣言，辦刊物，練兵操，競選舉，以及附帶發生趕校長鬧風潮，對於我都成了很親切的回憶的資料。這話距今，已有了二十多年，我現在回憶起來，並不追悔我做了我當初所做的事，因為「五四運動」有兩重意義：一是愛國的意義，這一番轟轟烈烈的運動，引起了全國的響應。使當時的奸佞爲之喪胆，當局有所顧忌；二是文化的意義，愛國運動很快的轉移了方向，一變而爲思想解放運動，對於古老的傳統的思想，發生懷疑，於是對於各方面的頑固保守的勢力，施行攻擊破壞，逐漸演成爲一種新文化運動。這樣意義大的一樁事，雖然損耗當時一些青年學生的時間精力，也是很值得的，對於一樁光榮的事，當然無所用其追悔。

但是現代的學生是否還要繼續「五四運動」的精神而活動下去呢？「五四運動」的精神是否已成爲完全不合時代的呢？學生是否應該繼續參加政治活動呢？對於這些問題，我有簡單的回答：如果「五四運動」做爲新文化運動解，則「五四運動」的精神，當然應該繼續下去，新文化運動並未成功，仍需努力，懷疑的態度，永遠是對的，不但要懷疑古舊的，也要懷疑新奇的，由懷疑過後而產生出來的信仰與認識，才能不是盲從的，才能算是理性的，我們不要以爲現在國家處處需建設與信仰，便急於要堵塞懷疑的思路，須知懷疑並不純然是破壞的，那是一種合理的思想方法的一部份，並沒有時代

性，我看到現代許多人在思想上誤入歧途，就是因爲缺乏懷疑精神，所以輕易的接受麻醉的宣傳，給人牽着鼻子走，而不自知。「五四運動」精神，在現在仍然是對症的藥，這是一點。如果「五四運動」做爲是一個愛國運動解，則老實講，現在學生根本需要再作「五四運動」式的愛國運動了，因爲時代不同，環境亦異，學生與政治的關係有重加檢討的必要，這就是本文所欲加研討的一點。

學生干政，不自「五四」始。大學生干政，在歷史上不是沒有往例，但總是在政治黑暗的時候，豺狼當道，釀成國家的危機，年紀大些的好人，相率不出，明哲保身，血氣方剛的知識份子，纔奮起呼號，名之爲干政，顧名思義，干政便是原來事不關己無可如何，才挺身出來干預政事之意，在學生這一方面來看，干政是激於義憤，是愛國精神的表現，當然比醉生夢死和消極避世的人要高出多多，但是站在國家立場，政事不由負責的人處理得當，而有待於學生出面干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祥的事。以後我們希望國家政事上了軌道，與論有正常宣導的途徑，決不希望再有不祥的事情發生。不過若責望青年學生從此埋頭讀書，不問政治，這也是褻激之論，任何人都不能和政治脫離關係，學生如何能是例外？不過學生和政治的關係要和普通人不同一些，至少有下列幾點是青年學生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第一、學生要學習政治。政治是人人應該有的常識，但這常識也要從學習得來，從技術方面講，政治並不僅是常識，而是相當專門的知識，更非學習不能領悟，學生們既然熱心國事，最低限度應該明白本國現行政制，可是看過大學生新生入學試驗試卷的人，大概知道一般青年人在這方面的常識是如何的欠缺。中學有「公民」一科，由於內容駁雜無常和師資缺乏，未能發揮其應盡的責任，這是大

家週知的事。大家都厭恨法西斯，但是法西斯的可厭處在那裏呢？怎樣才能打倒法西斯？我們不能用「法西斯強盜」這一個咒語，就把這個問題輕易勾消。大家都羨慕「民主」但見民主之可羨處在那裏呢？如何才能實現民主？我們不能把民主當做奇蹟而希冀其突然發生。一切標語口號，都只是標語口號，學生如果忘記他是學生，便該更進一步研討事情的真理，不為名詞所誘，等到常識豐富了，認識正確了，對於政治自然有了信仰和熱誠，自然成爲一個良好的公民。怎樣才能使學生對於學習政治感覺興趣？這是主持教育的人的責任，最要緊的是避免「官方宣傳」的方式，以免徒啓學生的猜疑反感，要採取開明的態度，把各種政治各派學說同時並陳，比較其得失，指點其優劣，使學生憑其良知良能自行抉擇。

第二、有一種政治技能。學生在學校裏，就應該先練習純熟的，那即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初步」，在西洋叫做「議會法」，從表面看，這僅是一些機械的法規，似乎沒有什麼重要，其實這是人羣集會所必需的知識，民主政治的初步條件，所以稱之爲「民權初步」，列爲「心理建設」的一項。一個會應該怎樣組織，主席應該怎樣推選，選舉應該怎樣辦理，議案應該怎樣提出，怎樣修改，怎樣表決，這一套技術，在學生時代如果練習純熟，將來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有無限的便利，而守法的精神負責的態度，以及少數服從多數的美德，均可及時養成。

我個人所受的高等教育，是恰在「五四」之後，學校提倡學生自治，學生會的組織，非常完備，有立法機關，有執行機關，另外還有「假法庭」的設立，我覺得那是一種有益的課外活動。現在的青年學生，似乎不大熱心幹這種事了，有政治興趣的學生，當然也「幹政治」但所謂「幹政治」乃是幹

實際政治，參加什麼祕密的行動去了。現在的學生沒有政治興趣則已，如有便是去革命，好像政治即等於革命，這完全喪失了學習的意義。「學生政治」這一名詞，已久不聽說，我願其復活起來，學生的政治才幹，政治慾望，政治技能，最好先在學校裏面培植起來！

至於實際政治，我不但不主張防止學生過問，而且還主張特別鼓勵學生去研究，但是我不贊成學生荒廢了讀書的正業，而去參加，「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固然是良好的格言，究竟只是「不忘」而已，同時並行，究竟是難能的。「九一八」之後，各地學生發生請願風潮，如火如荼，當時政府隱忍自重，幾不能見諒於人，及抗戰軍興，前方浴血的是士兵，後生產的是老百姓，當初搖旗吶喊的，而今安在？假使革命暴動是政治活動唯一的方式，那麼青年學生是頗優為之的，假使政治不應做這樣狹義解，而正常的政治活動，應該解為一種和平的，建設的，為公共謀福利的努力，那麼我們中國人雖然是比較的壽命較短，而成熟較早，似乎也還不至於需要一二十歲的青年學生去擔當政治的責任吧！

（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八、「五四」二十五年

傅孟真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的第二十五年紀念。「五四」事件已經過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在這樣變動劇烈的世界中，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可以有無窮的大變化發生。即在中國，這變動也是

空前的。所以若有人在今天依舊全稱的，無擇的，謳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演進國家演進的愚蠢，其情可憐。然而若果五四的若干含義，在今日仍有教訓性而並未實現，或者大勢正與之相反演進，自然不必即是國家之福，其事可慮。

「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畫的運動，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運動。這個情形明細的表現於其整個運動的成就，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這正是許多人貶責五四運動的根據。我以為五四縱有許多弱點，許多未成熟處，但這個消極的貢獻，却是極可寶貴的，也還是今天甚可警醒的。

何以呢？中國的存在有幾千年，自有其長處，即是說，有使他壽命如此長久的緣故。但是，這個幾千年的存在，論對外呢，究竟光榮的年代不及屈辱的年代多；論內政呢，內政的真正清明，直如四川冬天之見太陽，「生民多艱」，古今一致。所以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蕩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拖着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試問明哲保身的哲學，「紅老哲學」（紅樓夢老子，世故之樹之哲學），虛文哲學，樣子主義，面子主義，八股主義，官僚主義，封閉五官主義，這樣一切一切的哲學和主義，那一件不是建設近代國家的障礙物？在洗刷這些哲學和主義，自須對於傳統的物事重新估價一番。這正如尼采所說，「重估一切之價值。」自然，發動這個重新估價，自有感情的策動，而感情策動之下，必有過分的批評；但激流之下，縱有漩渦，他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今人頗有以為五四

當年的這樣重新估價有傷民族的自信心；不錯，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但是，與其自信過去，而這些未曾有的歷史奇蹟，以掩護着誇大狂，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這就是說，與其寄託自信心於新石器時代或「北京人」時代，何如寄自信心於今後的一百年？把一個老大病國變成近代的國家，有基瑪爾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Khalifat），這是土耳其幾百年霸權的遺物，在上次大戰中還有甚大的號召力，使土耳其雖敗不亡，然而基瑪爾勝利的進入君士坦丁後，毅然決然的廢止這個制度，這因為這個制度之於土耳其，對外雖有號召的大力，在內却是徹底革新的阻礙，基瑪爾務實不務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內廢止了他。又如中東近東人民習用的紅帽子，到屋子裏也不脫的，他也為文化大同起見廢除了他。至于文字的改革，習俗的改革，處處表現出他要徹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為甚麼不愛惜這些「國粹」呢？正因為這些「國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礙物。

我可以說五四的若干含義在今天仍有一訓性呢？大凡時代的進展，總不免一正一反一往一復。最近十五年，東西的若干強國——今日全是我們的敵人——各自有其特殊的國粹運動，我們也有我們的國粹運動。我們國粹運動自與他們的不同，這因為我們的「國粹」與他們的「國粹」不同。我們的國粹運動所以生於近來是很可了解的，在頗小限度內，有他的用處，然若無節制的發揮起來，只是防礙我們國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無窮，隨便舉青年一事為例說罷，這是大家都說今日的青年總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險三條路嗎？要想糾正這些，決不是用老藥方所能濟事的，無論這藥方是漢學的成儀齊莊，或是宋學的明心見性，這個，都打不動他的心坎，你說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動他的心坎，

只有以行動啓發其愛國心，啓發其祈求社會公道心，爲這些事，合生取義是容易的事，總而言之，建設近代國家無取乎世紀主義。日本在維新之初，除去積極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國體明徵」的神祕法門，日本之強，是他的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個神道狂，因而把日本捲入這個自殺的戰爭中，便是這神祕法門的效用。難道這是可以效法的嗎？所以中世紀主義也許可爲某乙某丙以忽不勒汗的過程成其爲呼圖克圖，而於全國家，全民族，是全無意義的。

五四的積極口號是「民主」與「科學」。在這口號中，檢討二十五年的成績，真正可歎得很。「民主」在今天，已是世界大勢所必趨，這篇短文中無法暢談，只談談「科學」。注意科學不是五四的新發明，今天的自然科學家，很多立志就學還在五四以前的。不過，科學成爲青年的一般口號，自五四始，這口號很發生了他的作用，集體的自覺總比個人的嗜好力量大，所以若干研究組織之成立，若干青年科學家之成就，不能不說受這個口號的刺激。在抗戰的前夕，若干自然科學在中國已經站穩了腳，例如地質，物理，生理，生物，生物化學，而人文社會科學之客觀研究，也有很遲的進展。若不是倭鬼來擾，則以抗戰前五年的速度論，中國今天可以有幾個科學中心，可以有幾種科學很像個樣子了。即是說，科學的一般基礎算有了。恰恰暴雨狂風正來在開花的前一夕。受戰事的打擊，到了今天，工作室中徒有四壁，而人亦奄奄一息，這全是應該的，無可免的，無可怨的。一旦復員，要加倍努力趕上去。不過，今天的中國科學確有一個極大的危險，這就是，用與科學極其相反的精神以爲提倡科學之動力是也。今日提倡科學之口號高唱入雲，而爲自然科學的建設不知在那裏，其結果只是些雜誌宣傳，而這些雜誌中的文學，每每充滿反科學性。太別說來，有狹隘的「功利主義」，這是使自然

科學不能發達的，然若自然科學不能發達，應用科學又焉得立其根本？又有狂言之徒？一往誇大，他却不知科學的第一義是不扯謊的。全部科學史告訴我們，若沒有所謂學院自由（Academic Freedom），科學的進步是不可能的。全部科學史告訴我們，近代科學是從教條，學院哲學（Scholarsticism）推測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社會成見中解放出來的，不是反過來向這些東西倒上去的。全部科學史又告訴我們，大科學家，自然也有好人，有壞人，原來好壞本自難分，有好近名的，有好小利的，原來這也情有可原，但決沒有亂說謊話的，作誇大狂的，強不知以為知的。大科學家自有一種德性，這可在蓋理律，牛頓，達爾文，巴斯德諸人傳記中尋得之，這些人與狗祿的經生絕無任何微量的相同處，所以今日提倡科學的方法極簡單，建設幾個真正可以作工作的所在，就是說，有適宜設備的所在，而容納真正可以作科學工作的若干人於其中就夠了。此外，便只是科學家自己的事了。此外，更無任何妙法。工作的環境可以培植科學家，宣傳與運動是製造不出科學家來的。

我要提出一個五四的舊口號，這口號是：「為科學而研究科學！」讀者以為我這話迂闊麼？只有這纔是科學的清淨法門！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重慶大公報）

九、「五四運動」與東方文藝復興 馮大麟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今日中國形形色色的社會事象，林林總總的時代思想，鑿鑿維存，光怪陸離，真極動亂的極致，舊的未去，新的方來，一面我們在思想上舊偶像的勢力未完全打倒

，一面新權威沒有樹立，一面龐大的農村經濟，已瀕於崩潰的邊緣，一面新工業的種子還難望茁壯成長，舊皇朝雖早已推翻，而舊官僚的傳統惡弊却深深開於今日的官場市府。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是決堤開關，難勝其苦，捨舊從新，不堪其煩，歷史的亂象未有甚於今日，這時代我們所遭受的不幸與創傷太大了。但另一方面，我們所受時代的賜予也太厚太多，一面我們可以縱覽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的知識寶庫，一面我們可並觀今日歐美各國的文化成果，一面可以聽舊社會裏的陳腔濫調，一面可以開新時代的號角晨鐘，古今並收，東西雜陳，時代給予我們研究學術的便利也真太大了。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有根據期望一偉大的文化時代之到來，在今日而貽誤時機，不但辜負時代，恐千百年之後的史家亦將引為絕大憾事。

時代的需要如此，社會的大勢如此，為什麼這呼之欲出的新時代新文化，還姍姍遲來，是不是我們缺乏時代的感覺歷史的銳眼，看不出這萬方期待的新文化新時代的痕影？抑或歷史的摻濁已來，社會的條件未具，以致這醞釀已久的潛伏已久的時代潮流，還不能流勢澎湃，奔騰有聲？在這裏，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表示對這時代的不同認識和期待；有人稱這新時代為戰國時代或新戰國時代，有的稱這新時代為中國文藝復興，有的認為五四運動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有的却期待着真正的中國文藝復興的到來。第一種說法，借形態歷史觀的理論，高唱戰國時代的重演，不知形態歷史學就是一門偽學問（將來當為專文論之）。此立論點既錯，自然全盤皆錯。第二種說法，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對這種看法不能同意。以中國的文藝復興期待這新文化新時代，在大體上我們認為這不失為有心人的呼聲，但五四運動無論就任何方面言，都不能擬比之於西洋的文藝復興，稍具西洋文化中知

識的人，均知道文藝復興的真正意義，在於：

一、新人的覺醒

二、新世界的發現

而這兩點都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探索古希臘文化而獲得的新啓示。但五四時代的人，一面因時代的情感不正常，對中國舊文化沒有深刻的澈底的自我認識，他們只能欣賞戴安娜崔適，不能欣賞孔孟老莊！這些却真正是中國舊文化的菁英。一面也可以說他們對於自我有所覺醒，對於世界有所發現，但五四時代的人所覺醒的所發現的，最多祇能說在中國文化由鴉蛻新的過程中還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因他們會覺醒到過去中國人所遺忘的東西，發現過去中國人所不知道的世界。）在世界文化史上由於它的內容的空乏，則幾乎毫無新的意義。我們知道文藝復興之所以爲文藝復興，不在它接受古希臘文化的結果，而在它從古希臘文化中獲得以前所未有的覺醒和發現，這種覺醒和這些發現不是古希臘的，而真正是西洋文藝復興的特殊成就。但我們若清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績，除了接受西洋文藝復興以來這一脈思想和體制把它移植到中國外，我們看不出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有什麼特殊成就，他們對人類的覺醒是西洋文藝復興以來對人類已有的覺醒，他們對世界的發現是西洋文藝復興以來對世界已獲得的發現，這些五四運動所有的覺醒和發現，在世界史意義上都是舊的而不是新的，都是已有的而不是新發現的，它不能與西洋文藝復興有同樣的意義，至多我們祇能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西洋文藝復興浪潮在東方的延長。

「五四」不能有西洋文藝復興的同樣意義，那我們今日不能在東方期待一與西方文藝復興「形

「繆律約相等」，「意義深淺相稱」的文化復興時代之到來？從時代之塔隙望出去，若不是我們短淺近視頑守，根據這時代的客觀大勢和文化成就，我們有權利相信這一東方的文化復興時代之到來並不在遠。第一從時代的大勢說；西洋文藝復興，最初是由一種對希臘古典文化鑽研的狂熱，乃形成一種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思想方式，藝術方式的再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時代給予他們的不正常的心理，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化，只有反感，沒有同情，如打倒孔家店，自然無法對中國古代文化發生研究的狂熱，更無從發掘真正的中國古典文化。但在今天，特別是抗戰勝利後，過去不正常的環境已漸漸走入正常，過去不正常的心理也漸漸歸於正軌，時代的壓迫去了；心理的偏見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亦多少揭露展開。這種客觀環境和客觀條件，在五四時代都不具備，是「五四」時代的人不易欣賞中國古典文化的主因，也是我們這時代較易認識中國古典文化真正價值的客觀因素。時代的浪潮都是一起一伏的，一激一盪的，有前一時代的反感，即有後一時代的同情，有前一時代的漠視，即有後一時代的熱狂，「五四」對中國古代文化「反感」「漠視」的不正常情緒過去了，今後自然會有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狂熱時代的到來。由這裏，我們相信東方的文藝復興將會在中國到來。

新人的覺醒，在西洋，是由靈到肉，新世界的發現，是由天國到大地，此二大文藝復興的潮流，漸漸形成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和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是文藝復興以後西洋文明的根本骨幹，從此西方人像生活在初春的晨光裏，微風在盪漾，百鳥在啼鳴，感到一種初脫離教會樊籠生活在大地快樂，可以縱橫奔馳，可以放任自由，可以從自然世界裏獲得無比的權力。不過人類往往是固蔽愚闇的，在一種思想具體形成潮流之後，往往批判地接，它，不反省地應用它，於是形成許多以偏概全以

一概百的謬見。原初自然主義唯物主義本有其不膺真理，但嗣後自然主義和唯物主義者，以爲人生不過肉肉的聚結，世界不過物質的架橋，這不特泯沒了人生異彩，也抹殺了生命價值。今日西方的想界的紊亂沉悶，正是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的自然歸宿，由此說來，在今日我們對東方的文藝復興作一種熱切期待和努力，我們可接獲的西方思想的啓示並不多，甚至東方文藝復興，在時代的進程上，注定了的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思想發展的自然反動，它是西方文藝復興在東方所激起的反潮，同時又是包括西方文藝復興成就的文化運動，是破壞的也是建設的，是批判的也是創造的。所以祇是「全盤西化」，並不能爲中國帶來偉大的文化復興時代，我們要「復興」還得本淵虛客觀的精神，向中國古代文化作核心的發掘，發現它的真正價值，賦予它以新的意義。我們要問是不是中國人生別有其安心立命的特殊境域？是不是東方人在內在精神裏早發現一寄託人生的恆常真實的世界？究竟人類生活思想的重心應設置在外抑在內？究竟人類文化的浪潮應導向那裏？這一切都是我們這時代不能不問的問題，我們要根本反省，澈底自覺，尤其要重新批判，重新估價，和重新認識，這是復興中國文化之路，也是東方文藝復興之路。

「朝既夜矣鷄鳴矣」（詩經日出）在月落西山之後，自然是「日出東方」時代的到來，請聽吧，金鷄備白的曉唱：

光明來自東方！

光明來自東方！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剛報）

編後記

「五四運動」是由中國青年倡導發動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在未確定「三、二九」為青年節之前，每逢「五四」，各地必舉行紀念，藉以喚起戰時青年的衛國熱情。自確定「三、二九」為青年節後，若干野心份子每值「五四」，必假借「文藝節」（今年為第九屆）或其他名義舉行紀念，藉以煽動一般青年不滿現實與反抗政府的情緒。本輯資料之編集，旨在說明「五四運動」的價值及其影響，並對「五四運動」作一有系統的批判，使一般青年認識今日之時代，已非「五四」之時代可比，「五四運動」之口號，已不足以充作現階段青年運動的綱領，更不足以滿足建國時期國家民族對青年的需求，同時使一般青年充分瞭解，由於時代的進步，三民主義青年團立後對青年運動的領導，實在已經遠非「五四」時代的青年運動所可比擬了！

從本輯資料的內容，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價值，也可以認清「五四運動」在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兩方面所表現的缺點，特別是認清她在文化運動方面所表現的缺點。此外，蔣主席在「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一篇演講詞中，會對「五四運動」的缺點有過極詳盡正確分析，詞載青年出版社出版之蔣主席對青年問題之指示一書之九四至七〇（三版），讀者可就該書細加研讀。

本輯所選資料，以不屬於任何黨派之學者專家的文章佔十分之六七，期能從客觀與學術立場分析「五四運動」的內容，藉以提供一種對「五四運動」的正確認識和正確看法。一論和五四運動一與「五

四運動與東方文藝復興」兩文，不但分別批判了「五四運動」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更進一步提出補充和發展「五四運動」內容的意見，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兩篇文章。傅孟真先生的文章，主張建設近代國家無取乎中世紀主義，最後提出了「爲科學而研究科學」的奮口號，仍不失爲一篇建設性的文章，所以一併錄入。

最後，特別向讀者聲明的是：本輯所收資料俱係採自抗戰以後的雜誌報章，戰前的文字，一篇也未錄列進去。



編者三十六年四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1288



1606624